

张月红解读问题 2：学术出版业抗拒变革吗？——续“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Part 2）

编者按

从 Part 1 中我们的读者对 8 位被采访和撰稿人的出版背景略知一二，他们中有入行几十年的资深出版人和学会组织的前负责人，还有活跃在出版前沿的技术平台创新者。当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对行业敏感问题的思考视角和观点表述，今天对第 2 个问题的 8 位撰稿内容做一些解译。

前文回顾

BDM 编辑张月红解读 | 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Part 1）

原文链接（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

Learned Publishing, First published: 12 October 2022

<https://doi.org/10.1002/leap.149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leap.1495>

IS PUBLISHING RESISTANT TO CHANGE 是学术出版业在抗拒变革吗？

引原文：2-Everyone keeps talking about “watersheds” and dramatic changes “any time soon” but scholarly publishing seems to be stuck in a fairly static bubble (e.g. the standard IMRAD format article and the conventional journal model, the use of Impact Factors to judge importance, etc.). Do you agree that we are not moving quickly to reinvent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nd (if you agree) why do you think we are so resistant to change?

每个人都在谈论“分水岭”和“很快”的戏剧性变化，但学术出版似乎陷入了一个相当静态的泡沫（如标准的 IMRAD (Introduction, Method, Result and Conclusion) 结构式文章和传统的

期刊模式，以及用影响因子来评估期刊的重要性等)。你认为该行业在 21 世纪的学术交流形式并非被迅速重塑吗？如果你同意这个观点，你为什么认为我们这个行业会抗拒改变呢？

对第 2 个问题的回答

第 2 个问题 8 位撰稿人的观点：

1) Richard Fisher 理查德·费雪：

简单回顾过去 50 年里的学术图书出版情况，我印象深刻的是该行业有着非常强大的连续性，最明显的是印刷作为一种主要发布形式而幸存。它在 20 年前确实受到快速印刷技术的巨大推动，以及在线书目快速搜索设施的开发，迄今为止，谷歌和亚马逊还是两个最重要的外部搜索阅览的创新者。故而图书馆的供应链完全被全球速度和服务期望所改变，从根本上说，也与亚马逊的零售服务优惠有关。

尽管社会变革确实对我们生产的产品有一定阻力，因为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得 ALPSP 成立时，加州这样的大学系统会将其收入的 50% 花在获取、管理和保存“书籍”上，从广义上说这也是人文社科（AHSS）学术交流的中心模式，现在这个数字只接近 5%。总之，自然科学（STEM）在日益全球化的网络研究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占有主导地位。鉴于目前对“科学衰落”和“公众对科学缺乏信任”（部分也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而引发）的日益担忧，的确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但却鲜为人知的悖论。

2) Niamh O'Connor 尼娅·康纳：

当学术期刊转移到网上，这并非重新思考方法和过程，而是熟悉的“物理”程序和格式在数字环境中被重新创建而已。当然毫无疑问人们要“知道”网络出版做得更好的理由，比如研究社区需要科学价值观得到维护，研究人员所依赖的信任和信誉需要维护等。因此可以这么说，网络的初期实践并没有让人们失望。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研究评估的实践、改变系统所需的财政和资源成本，以及许多发行者的商业模式与文章版本记录的关联，这些都已经变得根深蒂固。当然我们的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惯性和风险规避，我们需要彻底地从根本上改造和健全这个系统，开发出适合数字时代的信任点，拥抱开放，将出版作为一个与研究过程相行并举的过程，支持促进可重用和可信任的知识，需要全球参与，共同建立包容和公平的相关利益者共融的商业模式。

3) Sally Morris 莎莉·莫里斯:

大约十年前,我和3位合作者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书《期刊出版手册》(The Handbook of Journal Publishing)中预测了“学术交流的未来(参见书的第13章),我们认为学术交流将会演变为反思学术活动的动态,相互关联的本质,随之相应的期刊也需要反映这个动态。虽然自那以后我离开了这个领域,但现在我看学术交流的进化速度比人们预想的要慢。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期刊还没有被彻底强迫重新塑造他们的角色。阻力在哪里?我怀疑部分原因可能是学者和他们所在的机构仍然需要在高地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获得“奖励(“brownie point”)的方式没有什么改变。而不得不这样做的现实是,重新设想期刊的“继任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有的期刊出版商,舒适健康的利润(如果下降的话),不愿意,或许也无法做到大动干戈的改变。或许我们所需改变的新思维和新技能的更大动力可能来自传统出版界之外?

4) Josh Nicholson 乔什·尼科尔森:

我认为学术出版一直抵制大幅度的改变是有原因的,例如,它惊人地专注于出版的持久性、存档良好的元数据,使得发现和引用1665年的论文与引用2022年的论文一样容易,这是一件好事,可能不应该改变太多。然而,我们本可以在发表论文的类型上进行更多的改进,更好地整合我们的数据,并激励研究人员不仅发布“积极”的结果,正如我们在其他行业看到的那样,信息传播的巨大变化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而且并不总是有益的,有时还会导致错误的信息和社区两级分化(如新闻)的现状。我认为在学术出版中采用大变革有一个很高的门槛,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研究出版是重要的工作。尽管如此,新型的文章类型和新的评价方法仍有很大的空间,但这大多会受到社会的限制,而不是技术。当然,我希望Scite工作和“智能引用”的引入会给我们的行业带来巨大的改变。引文是学术出版的核心部分,自几十年前“科学引文索引”推出以来,引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变化,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限的衡量标准。但如果我们能揭示隐匿在引文后面的数据,提供上下文(如在网上向研究人员示意文本引用的上下文,或称引用语句),我们可极大地提高分析效益。此举能知道一篇文章的题目、话题、及研究者或期刊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引用的信息了。即引文陈述既可以丰富引文位置信息(引言或方法部分等),也可分类表明它是否对被引作品提供了学术支持或对比评论的证据,以及与其他参考文献的链接,这样就可以通过引文文献进行追踪科学分析,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想这样做的好处可能会惠及到其他的引文索引。

5) Robert Parker 罗伯特·帕克:

1985年6月开始我的第一份科学出版工作时,就被告知这个行业存有连续性危机,期刊或在2-5年的时间,将被下一个新东西而取代。当时我们的期刊经营的也不好(特别是积压和出版时滞等),而且在学科的新兴领域是否开发新期刊等问题上做出了一些糟糕的决定。我相信,这类事情在当时的学会期刊经营中很常见,这也导致了学会期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活在“要么发展 要么死亡”的压力下。我想在80年代末,学会期刊的关闭、期刊的合并、学会放弃自主出版期刊、或与商业出版商合作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电子革命对知识传播的方式真是带来了突破性变化。然而,对我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作者的数量大幅增长,缓解了学会期刊要变革的速度。而且学会社区重新强调使用那些已经建立的各项指标,并通常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使用这些指标!譬如在1985年,RSC发表了3312篇文章,其中几十篇来自中国;而在2021年,RSC发表了36068篇文章,42%来自中国,国际作者的数量变化真是惊人的。我认为有太多的学术团体试图重新塑造出版业,然而大多数“传统”出版商在做出任何彻底改变之前,可能会更着眼于作者和用户的需求,他们似乎对眼下的现状还比较满意。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做决定时取决于“我们”是谁?出版环境中的初创公司可能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与大型、成熟的出版商截然不同的答案。若从期刊作者与读者的角度来看,也许存在着“如果它没有变坏,就不要去修复它”的因素作祟?

6) Andrew Preston 安德鲁·普雷斯顿:

巨大的市场变化是无法预测的,它们往往发生在市场准备就绪的时候,而且通常不会像你预期的那样。当下就有一个转变正在发生中,并具有里程碑式的潜力,如在COVID-19的“刺激”下,研究人员已经习惯于通过视频在线讨论和交流,但我们无法预测这对传统期刊和科学传播有什么影响?但是研究人员对学术交流有一个特定的要求,即内容可查找、可索引和可引用。当下典型的视频消费模式尚且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为阅读PDF仍然比消费原始视频容易得多,在会议上会见潜在的合作者比在Zoom上交流效果会更好。这些挑战蕴含着21世纪为科学传播和科学界开辟新途径的潜力,那么为学会和出版商(学术界的传统枢纽)开辟新的运作模式的潜力关键是什么?是投资支持研究人员转向在线视频的工具和技术,这也是我的创业公司Cassyni.com当下的一个新使命。

7) Pippa Smart 皮帕·斯玛特: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即21世纪初数字革命将如何改变学术文章(参见 Sally Morris 的社论“是期刊文章适合目标,还是止于过去? Sally Morris' editorial: 'Is the journal article fit for purpose, or stuck in the pas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87/095315108X378703>)。但这以后的变化是渐进式的,我经常想这是为什么?我怀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期刊文章是适合于目的性表达,它有着明确的内容信号,当然也有改进的地方(如参考文献的链接仍然是我的最爱)。第二,无论什么伟大的出版商可能提出什么伟大的想法,均必须符合学术界所希望的,科学内部的验证系统。这些系统(不论是发布新闻稿等)仍然是基于标准索引和引用指标,这不可避免地阻碍或显著地减慢了一些创新模式的引入过程(如 F1000Research)。我想直到学术界(我指的是全世界)改变了自己的系统,出版业(和研究人员)可能仍然将无法自由地改变自己。

8) Helen Zhang 张月红:

在这里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可以说明问题:“What is Rational is actual and 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即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中文世界常简言之“存在即合理”。借此来推论,自1665年第一份学术期刊《哲学会刊》诞生以来,至今天的乌利希期刊库网站注册了全球的90326种学术期刊(<http://ulrichsweb.serialssolutions.com/search/-1616811946>),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模式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而学术期刊的论文格式IMRAD(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早已被科学界认为是发表研究论文的合理的表达形式。另一个例子是,自19世纪以来,同行评议也一直被科学界和出版界共同认定为确保科学交流的质量和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认为,数百年来学术出版(自然学科 STEM 和社会人文学科 AHSS)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形式,即使在21世纪信息大变革的时代也没有被重塑,因为学术出版的元素,从文章的撰写格式到期刊的权威认证过程,已经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一种权威形式。对于科学出版,无论是以纸质还是在线形式,已经存在了357年,这提醒我们,黑格尔作为合理与存在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学术出版而得以例证,也如今天我用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大篆(它也存活了~3200多年)庆贺ALPSP(全球学术与出版者协会)50周年华诞(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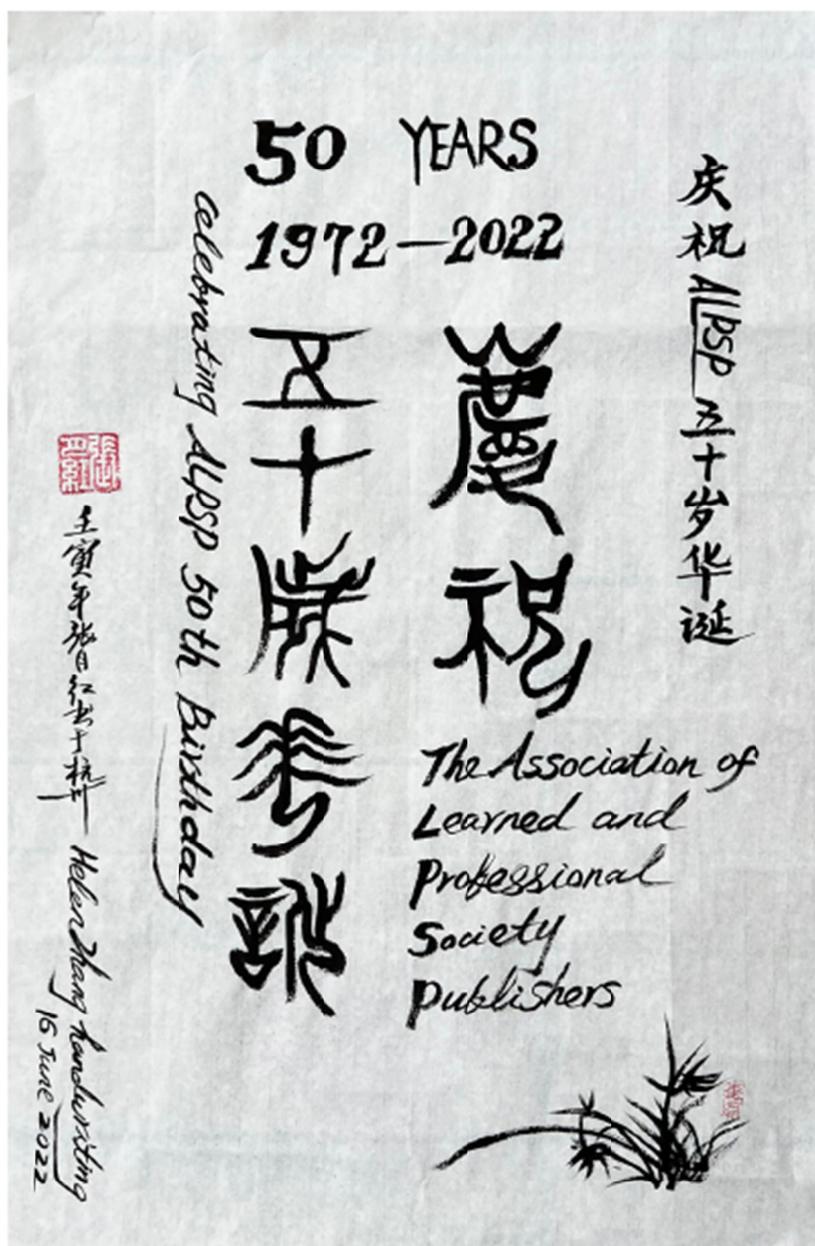


FIGURE 1 Congratulations to ALPSP, drawn by Helen Zhang.

——BDM 编辑部张月红编译 (Part 2)